

中沙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

王 猛

内容提要 事实证明，伊斯兰因素对中沙交往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经历了从中华民国时期天然联系到新中国早期阻碍延滞的曲折发展后，从1979年始，中沙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主要表现为三点：阿富汗抵抗运动与中沙接近；宗教联系与中沙建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中沙的危机管理。

关键词 中国；沙特；伊斯兰因素

作者简介 王猛，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03级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 710069）。

Abstract Islamic factor has being brought important influence on Sino-Saudi diplomatic relation, because China has twenty million Muslim populations and Saudi is spiritual homeland of Muslim. Based on the zigzag development from natural affiliations to encumbrance, the display of Islamic factor in Sino-Saudi diplomatic relation offers three attractions: Afghanistan Resistance and Sino-Saudi's approaching, religious contacts and Sino-Saudi's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Islam fundamentalism movements and Sino-Saudi's crisis managements.

Key Words China; Saudi Arabia; Islamic Factor

关注中国与沙特双边交往中伊斯兰因素有两点原因。一方面，伊斯兰教自兴起以来，传播范围不断扩大，现在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共有337个，分布于117个国家。^①作为在伊斯兰世界具有影响力的地区大国，沙特不仅因两大圣地护主的身份而成为世界穆斯林民众的精神向往之地，且宗教立国理念及宗教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更使其对外政策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另一方面，沙特虽是与中国建交最晚的阿拉伯国家，但对拥有两千多万穆斯林的中国而言，与之发展紧密的经济和政治联系，既源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丰富的油气资源和独特的历史文化，又源于中国的国际战略考虑、日益增长的国家需求与世界大国的责任意识。

一、宗教因素与国际政治

在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宗教一直被视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力量，宗教既借助神灵的威名给信徒提供信仰体系、价值观念和内心安宁，同时又通过制定教规和宗教仪式达到对信徒的组织控制。在冷战后宗教因素之所以能广泛介入国际冲突，宗教文化的对立与冲突之所以成为国际和地区冲突的重要焦点，主要根源就在于它与民族存在千丝万缕、难解难分的

关系。^②首先，宗教是形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基础之一，每个民族几乎都有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其二，宗教借助民族共同体而存在并实现着自己的社会功能，“宗教通过它的民族成员的活动，使其宗教意识形态、教义主张得以渗入到该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形成以宗教意识为核心与灵魂的民族传统信仰和传统文化”^③。在二者的依存关系上，宗教非但不会因为某一民族国家的毁灭或民族独立自主权的丧失而消亡，反而因此更能够容易激起民众热情和凝聚力而成为民族国家复兴的旗帜。“宗教所具有的神圣性与超越性必然会使各民族捍卫自己的宗教信仰，因而宗教既可以成为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的民族、国家融合的精神纽带，也可能成为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国家分裂的原由与根据”^④。正因为此，在现代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任何政治力量都从本集团的利益出发考虑和处理政治与宗教关系，利用宗教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和体制上层建筑的双重特点，既从思想理论方面影响

^②金宜久先生认为“宗教因素”就是“宗教在社会不同领域的衍化和延伸，并得到相对独立发展的、又与宗教密切相关的种种社会现象”。例如伊斯兰因素就是伊斯兰教在社会不同领域的延伸并得到相对独立发展的不同社会现象。详见金宜久：《冷战后的宗教发展与国际政治》，载《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③金宜久：《冷战后的宗教发展与国际政治》，第6页。

^④梁丽萍：《当代国际冲突中的宗教因素》，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6期，第26页。

^①金宜久、吴云贵：《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群众,又以组织制度方式统辖群众,从而使宗教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伴随着国家兴衰而不断上演的民族组合和分化,现代宗教对国际政治事务表现出日益浓厚的热情与关注。从人类历史与现实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初期的图腾崇拜和原始宗教,还是成熟时期的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甚至当代社会种种具有“非神学”特征的新宗教、准宗教运动,都对同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构成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40~80年代,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处于政治上对峙、经济上竞争和军事上对抗的冷战状态,双方除强化针对对方的宣传战外,也都加强了对各自社会的精神控制。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国家,宗教对国家政治的干预以及对世俗社会的渗透都在客观上被限制在最低程度。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各大宗教进入了全球性复兴时期;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地缘政治版图的松动和重组,各主要宗教势力开始积极介入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生活,如当代伊斯兰教即在40多个国家掌控国家政权。宗教对国家政体、外交政策及社会生活的干预不但成为这次全球性宗教复兴浪潮的重要标志之一,且日益成为分析国际政治格局变动时不容忽视的力量。^①

二、伊斯兰教与1979年以前的中沙关系

伊斯兰教在唐宋时期传入中国,从元代开始成为与其他宗教并行的独立信仰体系,现在则成为在中国分布最广、信徒最多的宗教之一,回、维吾尔、撒拉、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塔尔、塔吉克、乌兹别克、东乡、保安等10个民族全都信仰伊斯兰教。在中国与中东国家建交过程中,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宗教及其组织的内外因素显现出综合性和整体性的互动特色,“每个行为体都试图考虑国内层次和国际层次上的预期反应。在国际层面达成的协议会改变国内因素的特征,而国内的政治因素变动又为国际协议的达成提供了新的可能性”^②。

1900年前后的大清帝国已基本丧失了独立对外交往的能力,继之而起的中华民国因处于社会转

型期,也因受列强争霸国际格局的制约,至少在1927年以前还顾及不到中东地区。因此,中国穆斯林与外部伊斯兰世界有限的宗教和文化联系就填补了国家交往层面上的空白。^③ 值得一提的事件有:1907年,王浩然考察了一些中东国家后在北平创立了回教师范学校;1921年,王静斋、马宏道在爱资哈尔大学学习并得到校方资助;1931~1934年,中国伊斯兰教界前后选派了6批、共36名留学生到爱资哈尔大学学习,马坚、纳忠、纳训等知名的伊斯兰学者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一般民众层面,中国四分五裂并处于半殖民地状态,作为精神向往地的中东地区对中国穆斯林有着非常重要的吸引力。在此特定时代背景下,南京国民政府逐步与中东国家开展往来,截至1947年已与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与伊拉克、阿富汗、沙特签订了友好条约。与中国建交的中东国家还有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三国。由于中国拥有较好的国际地位,且参与国际事务的主要动机是展示新近获得的大国地位,所以二战结束初期的国民政府宣布:“凡是已获得独立的亚洲国家,都设法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没有取得独立的国家,国民政府也要设法建立领馆,开展贸易往来,以树立其作为‘亚洲国家代表’的形象”^④。

在1949年前后,约1万名中国穆斯林移居沙特,此前已在国外的近百名穆斯林则直接前往约旦,而在爱资哈尔大学学习的部分中国留学生于1949年后留在开罗。穆斯林世界联盟在1992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居住在吉达和麦加的中国籍穆斯林约1万人,除1000名回族人外,其他基本上都是维吾尔族人。他们虽仍同家乡保持着某种联系,但第二代移民已基本不会讲汉语。这些移民中最有名的是青海军阀马步芳,他出逃时带走的家属和部属约有300人,他们在沙特呆了1年之后开始各奔东西,马本人移居开罗,他的儿子和手下的十个将军则离开沙特前往台湾。1956年中埃建交后,马步芳返回沙特,随后出任台湾当局的驻沙特“大使”多

①许涛等编:《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41~42页。

②薄燕:《双层次博弈: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互动》,载肖佳灵、唐贤兴主编:《大国外交》(上),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③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1~445页;左文华、肖宪主编:《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75~378页。

④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17~719页。

年，后于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客死沙特。^①

在经过初期的民主改革之后，新中国重新开放清真寺、酌情允许穆斯林继续拥有自己的土地、吸纳伊斯兰教界领导人进入人民政府，不仅向世界表明中国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且还借以培育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伊斯兰教朝觐团由国内不同地区的 16 位代表组成，虽最终因沙特驻巴基斯坦公使馆拒签而未成行，但朝觐团所做的大量宣传工作使国外穆斯林初步了解了新中国。可以说，新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和宗教联系，增进了与各国穆斯林的友谊，有助于打破建国初期外交方面的孤立局面。事实上，在中国发展与印尼、巴基斯坦、埃及、叙利亚、也门和阿富汗关系中，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民众这两个平台曾起到过比较重要的桥梁作用。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的沙特不仅在一些地区性重大问题上与中国持近似立场，如拒绝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支持埃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对英法实行石油禁运等，且连续在联合国讨论涉及中国的问题上投中立的弃权票，没有因为朝鲜战争而谴责中国是“侵略者”，不支持美国“延期讨论”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新中国因之也把沙特看作是一个追求独立外交政策的国家，重视发展双边关系。在 1955 年万隆会议期间，达浦生和马玉槐以顾问身份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与沙特首相费萨尔的会谈，并在当年率领 19 人朝觐团到达麦加。达浦生大阿訇是中国内地享有盛名的四大阿訇之一，时年 82 岁。第二年，伊协主席包尔汉·沙西地带领的 37 人朝觐团，不仅完成了朝觐功课，而且会见了沙特国王、首相和财政大臣。“包尔汉能会见如此重要的沙特高层领导人，表明他不仅是宗教人士，而且是中国外交部的重要人物”^②。

不幸的是，由于东西方阵营之间的严重对峙，总体上倾向西方的沙特国王费萨尔认为鼓励动乱和革命的共产主义与伊斯兰教有着根本性的冲突，共产主义势力向中东地区的渗透不仅对沙特王国，而且对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抵

制共产主义就成为费萨尔时期沙特对外政策的基本立场。费萨尔在 1963 年说：“我们不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不相信除伊斯兰之外的任何主义，我们只相信伊斯兰”，并声称“反对伊斯兰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③。更有人认为沙特人想征服的一个“主义”是共产主义。^④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一些革命性外交政策以及民族政策上的某些失误，使沙特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对新中国持较消极的看法。“沙特尤为担心中苏通过纳赛尔主义、复兴党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对整个中东地区形成威胁。在沙特看来，中苏对亚丁政权和阿曼佐法尔地区叛乱的支持、中国对外常年累月的革命性宣传都对半岛和阿拉伯地区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⑤双方在随后一段时期内的互动使彼此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沙特方面严格限制中国朝觐团在沙特的活动，于 1957 年把与台湾的关系提高到大使级，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了密切的双边关系。两国关系冷淡，中国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宗教制度、民主改革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失误；^⑥二是中国对中东地区革命运动的热情支持，也让沙特等君主制国家深感不安。这一时期中国运用伊斯兰教培育与沙特关系的做法未见成效，两国关系发展受阻。

三、伊斯兰教与 1979 年以来的中沙关系

1979 年中国的宗教政策发生了巨大转折，导致一贯敌视中国的苏联新闻社撰文批评中国以“出口”为目的的宗教政策有悖于宗教本身的“内部消费”含义。^⑦从此，中国政府不仅恢复了“文革”期间曾被禁止的宗教习俗，重新开放清真寺和穆斯林学校，

③肖宪：《传统的回归：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6 页。

④【英】彼得·霍布德：《今日沙特阿拉伯》（梁丙添译），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11 页。

⑤Mohamed Bin Huwaid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Arabia and the Gulf, 1949-1999*, p.213.

⑥关于宗教民主制度改革的弊端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强行废除一些本属正常的宗教仪规，使信教群众转入“地下宗教活动”；关闭及合并的一些宗教场所过多，给穆斯林群众的宗教活动带来困难；在清除宗教界反革命分子时打击面过宽，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断发生的阿訇逃跑和自杀事件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出现了许多伤害穆斯林宗教感情的错误做法，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同穆斯林群众的关系。详见李兴华等著：《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43~846 页。

⑦新华社索非亚 1979 年 9 月 4 日电：《中国：宗教手腕》，载《参考资料》1979 年 9 月 6 日，第 51~52 页。

①Lillian Craig Harris, *China Considers the Middle East*, I.B.Tauris, 1993, pp.65~66.

②Mohamed Bin Huwaid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Arabia and the Gulf, 1949-1999*, Routledge Curzon, 2002, pp.213~214; p. 215.

印刷《古兰经》和其他经书并分发给穆斯林,而且又一次把宗教当作实现外交目标的重要领域。^①80年代,中沙同仇敌忾地参与阿富汗抵抗运动,并于1990年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但“东突”分离主义势力借助宗教旗帜对中国西北边疆安全构成了影响,成为90年代中沙双边关系中最具挑战性的议题。

1. 阿富汗抵抗运动与中沙接近。在70年代后期伊朗建立霍梅尼政权、中国与西方关系日趋密切而美苏缓和关系遭遇挫折的情况下,苏联为防止南部边境出现一个敌对政权而危及边境安全,于1979年12月27日入侵阿富汗。以此为开端的阿富汗抵抗运动,既为伊斯兰国家提供了一致对外的难得机会,也为刚开始改革进程的中国参与中东事务提供了平台。与以往不同,中国这次参与中东事务不仅符合自身的国家利益,且与世界和中东地区大国的立场和步调一致。伊斯兰会议组织于1980年1月27日通过决议,指责苏联侵略了阿富汗的独立、主权和人民自由,暂停阿富汗的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资格,敦请各成员国不要承认阿富汗的非法政权,断绝与阿富汗卡尔迈勒政权的外交关系。同年6月,伊斯兰会议组织阿富汗问题三人委员会在瑞士与阿富汗抵抗运动领导人举行会谈,做出了向阿富汗穆斯林抵抗运动各组织提供政治、道义和金钱援助的保证。^②20世纪80年代,沙特政府不断强化自己在伊斯兰国家的领导地位,而受其鼓励去阿富汗的好几千沙特人也都把“圣战”看作是一种虔诚的爱国行为和宗教行为,一些志愿者甚至来自非常富有的家庭。沙特政府对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支持“一方面是要同伊朗争夺对各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影响,同时也以此配合西方的对外政策,转移各国激进力量的注意力,将他们的反抗情绪引向反对共产主义……减轻国内政治压力,并对一些亲苏的民族主义政权形成一定的压力”^③。

以阿富汗伊斯兰抵抗运动为平台,中国不仅与中东国家极大地改善了关系,且把70年代的中美战略合作又延续了整整十年,形成了20世纪中美

关系史上的第二个蜜月期。1982年12月24日,即苏联侵阿三周年之际,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伊里亚斯·沈遐熙向阿富汗穆斯林发表广播讲话,赞扬他们的英勇斗争既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也符合伊斯兰精神,必将得到一切主持正义国家的声援和支持;强调“中国穆斯林将一如既往地坚决支持阿富汗人民和穆斯林反抗苏联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直至外国军队全部撤出阿富汗”^④。从1980年到1990年,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等机构通过巴基斯坦政府和联合国难民署等机构,向阿富汗难民提供了价值2355万元人民币和15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中国政府同时为阿富汗抵抗运动提供了一定的军事装备。当阿富汗当局就此提出抗议时,外交部发言人明确指出,中国和国际社会支持阿富汗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是无可非议的。^⑤

2. 宗教联系与中沙建交。中国伊协在80年代积极开展同亚非伊斯兰国家的友好往来。一方面,先后邀请和接待了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伊斯兰组织、穆斯林友好代表团、旅游团,向他们展示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民族平等和社会安定,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穆斯林地区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还组团到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访问与学术交流,如1987年12月在北京举办了“伊斯兰世界联盟伊斯兰宣教讨论会”,和很多国家的穆斯林以及一些国际宗教组织建立了联系,这些国际组织包括伊斯兰世界联盟、世界穆斯林大会、利比亚世界伊斯兰宣教协会、马来西亚福利机构宣教会、印尼穆罕默德协会等。80年代,中国伊协还与伊斯兰会议组织所属伊斯兰发展银行签订了合作协议,引进捐赠资金406万美元,用于建造宁夏、北京等地的经学院和阿拉伯语学校。^⑥相关部门不仅破例允许中国伊协接受伊斯兰会议组织代表团1981年访华时的50万美元捐赠,而且允许穆斯林世界联盟资助中国的穆斯林学生在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从而向“访问团展示了友好姿态,表明中国共产党并不歧视中国穆斯林少数民

①Mohamed Bin Huwaid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Arabia and the Gulf, 1949~1999*, p. 219.

②刘竞、张士智、朱莉著:《苏联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页。

③蔡佳禾:《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

④伊里亚斯·沈遐熙:《向阿富汗穆斯林的广播讲话》,载《中国穆斯林》1983年第1期,第29页。

⑤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

⑥李兴华等著:《中国伊斯兰教史》,第849~850页。

族”。穆鲁夫·达瓦利比 (Marouf al-Dawalibi) 是世界穆斯林大会主席兼沙特法赫德国王的外交与宗教事务顾问, 他在 1986 访华后留下了良好的印象。^①

中沙建交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双方信守诺言、相互促进、水到渠成。沙特是与中国建交的最后一个阿拉伯国家, 中国则是长期以来与沙特建交的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沙特 1927 年曾同苏联建交, 1938 断交)。中沙建交“突破了国际上认为沙特不同共产主义国家打交道的普遍说法, 再次证明了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的正确性。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次重大胜利”^②。1982 年 6 月,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代表全中国穆斯林电贺沙特新国王法赫德陛下即位, “祈求真主赐予国王陛下身体健康! 祝中沙两国人民和穆斯林间的友谊得到发展”; 法赫德国王则覆电致谢, 祈求真主赐予双方“襄助和成功”。^③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沙之间文化、宗教往来的政治色彩非常浓厚: 1984 年 9 月带团朝觐的中国伊协主任沈遐熙不仅出席了法赫德国王举行的国宴, 而且向国王及两位王储亲致节日问候; 1985 年 12 月访问利雅得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伊斯梅尔·艾迈提会见了沙特的大穆夫提伊本·巴兹。“中沙之间所有的宗教互访都可看作是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举措。两国人民的直接接触是促进双方互相理解的第一步, 它第一次在沙特的宗教和政治领导人中留下了积极的印象。而在沙特这样一个宗教领导人地位显赫的国度, 伊斯兰教对沙特在 90 年代初期决定与中国建交的巨大影响是无法忽略的”^④。

3.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与中沙危机管理。在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的 90 年代, 受海湾战争巨额费用支出和石油价格下降的双重拖累, 也受原教旨主义组织“伊斯兰拯救阵线”在阿尔及利亚崛起和发展的警示, 出于对自身安全和美国压力的考虑, 沙

特政府在减少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财政支持的同时, 开始对一些极端主义组织采取镇压方针。一些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及其组织因而同沙特政府结怨并将其当作攻击对象, 经常挺而走险地诉诸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行动。1995 年的利雅得爆炸事件和 1996 年的宰赫兰基地爆炸事件表明, 曾得到过沙特政府支持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 开始以有组织的暴力活动形式威胁沙特王室政权, 成为沙特国家的不稳定因素, 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就把推翻沙特现政权作为其最终目标之一。

因中国西部地区在历史、宗教、文化、语言等方面与中东国家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也因我国的对外开放与世界范围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运动的兴起基本同步, 中国与沙特等中东国家的文化交流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消极因素。在伊朗霍梅尼革命和阿富汗抵抗运动蓬勃发展的双重背景下, 土耳其、沙特、阿联酋、伊朗、巴基斯坦等中东国家都加强了对中亚地区施加影响, 这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极端势力提供了国际化扩散的契机。这种扩散对中国的危害不仅表现为长期的一般性渗透, 而且比较严峻地表现为集三股恶势力于一身的“东突”势力开始与境外“基地”组织等国际性恐怖势力、分裂势力相勾结, 接受后者的训练、武装和资助, 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

鉴于中国已参与了几乎所有的国际反恐公约, 与世界主要大国在反恐领域的利益交汇点越来越多, 也鉴于恐怖组织的国际化和金融体系的全球化, 反对“东突”不仅需要世界范围的广泛合作, 而且斗争本身就是国际反恐斗争的重要内容。因此, 中国的反恐策略是在加强国际反恐情报共享、控制恐怖分子的财源和资金流动的同时, 坚持不把属于极少数极端邪恶势力的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或宗教挂钩。但同时, 因伊斯兰世界自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遇刺以来, 就一直是个矛盾错综复杂的地区, 任何参与其中的外来力量都无法回避矛盾。所以, 中国的反恐斗争应保持与中东国家没有历史宿怨的优势、沿袭既往的积极防御态势, 通过上合组织等区域性机制进行反恐, 打击三股恶势力。

四、结语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都属东

①Mohamed Bin Huwaid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Arabia and the Gulf, 1949~1999*, p.220.

②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 50 年》, 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609 页。

③《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电贺沙特新国王法赫德陛下即位》, 载《中国穆斯林》1982 年第 3 期, 第 42 页。

④Mohamed Bin Huwaid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Arabia and the Gulf, 1949~1999*, p.221.

方文化,二者在社会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方面有许多相同和相似之处。中国是东方的文明古国,沙特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双方都强调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主张不同文明间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反对文明冲突和对抗。在加强人文交流和文化合作的基础上,中沙两国关系在新世纪已超越了初期侧重宗教的往来,形成了互利共赢、务实合作的新型双边关系。

一方面,作为亚洲东西部的重要国家,中沙双方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且没有根本利害冲突,都坚持把对话作为实现和平的途径,认为一切有关中东地区的行动和倡议,都应以实现本地区和平、和谐为目的,都应尊重本地区国家和人民的选择,并同本地区国家广泛协商,因之在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近的观点和立场,有着合作互利、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共同愿望。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在中东问题上所持的一贯公正态度,以及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民族与宗教挂钩的原则立场,得到沙特等广大阿拉伯国家的一致认可与赞赏。沙特则在与美国关系出现逆转的情形下,在战略上主动转向中国,开始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外交支持力量之一,希望中国在联合国及中东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以制衡美国的霸权地位与单极的负面影响。沙特发行量最大的《利雅得日报》就曾发表社论指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是一个能为自己谋取利益、也能为别人利益着想的国家。”^①新世纪以来中沙双方在人权及反恐等重大问题上的相互协调和相互支持,就是双边政治关系健康发展的例证。

另一方面,沙特是世界能源市场的“巨无霸”,碳氢能源的探明储量和产量均居世界前列,而中国则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高度的互补性使得双方经贸增长强劲,双边贸易额由1990年建交之初的2.9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160.7亿美元。目前,沙特已成为我第十大进口国,是我在西亚非洲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成为沙特的第四大进口国。2005年,沙特向中国出口了2200万吨原油,不仅以原油进口17.5%的占有率列

中国第一大能源供应国,甚至基于战略性原因还考虑在中国东南部沿岸城市设立一个油库,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向中国供油。2006年4月,根据双方正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到2010年将为中国石化及其子公司年均供油5000万吨,争取将现在的对华出口原油量翻一番,与中国石化在福建炼油乙烯一体化基地及其相关项目上继续加强合作,希望用11.7亿美元收购青岛炼化厂。而中东最大的石化公司——沙特基础工业公司表示有意在中国大连投资价值53亿美元的石油化工计划,并希望同中国有关企业的合作能取得互利双赢的结果。在制度建设层面,中沙两国在胡锦涛主席访沙期间签署的《能源框架协议》标志着中沙能源合作开始从石化中下游领域进入油气勘探、开采的上游领域;中国与包括沙特在内的海合会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与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内的多边合作也在稳步推进。总体上看,中沙的经济发展为两国加强经贸合作带来了重要机遇,两国企业在能源、工程和通信等领域的合作发展尤为迅速,两国经贸合作正朝着更广领域、更大规模的方向发展:中沙贸易额有望在5年内从现有的160亿美元跃升至400亿美元,且将逐渐形成一个以能源合作为核心,贸易、投资、矿产、石化、工程、通信等全面展开的互利合作格局。

2006年1月,阿卜杜拉国王把中国作为他登基后出访的第一站,中阿高层领导就建立中沙战略性友好合作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时隔3个月,胡锦涛主席访问沙特,并作为首位外国元首在沙特王国协商会议上发表了题为《促进中东和平,建设和谐世界》的演讲。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互访,就推动双方战略性友好合作关系的深化发展共商大计,签署了10项合作协议,这不仅在中阿关系史上是第一次,而且也为中沙友好合作注入了强劲动力,是中沙关系全面提升的重要标志。

(责任编辑:杨阳 责任校对:孙德刚)

^①“沙特媒体高度关注胡锦涛主席访问沙特”,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4/24/content_4467359.htm。